大师的智慧

梁实秋

大师的智慧

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蒋晔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需要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作者简介

蒋晔，祖籍浙江省嘉兴市，1962年生于河南省商丘市，现任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现已访问300多位，其中有南怀瑾、冰心、费孝通、雷洁琼、启功、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还有宗教界人士本焕法师、觉光法师、夏荆山居士、汤恩佳等。出版有《我的生命中只有祝福》《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新世纪论语》《人生智慧丛书》《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白寿彝画传》《佛教图藏500罗汉》等近300余种图书。

2008年参与推动的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为“中国印”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

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序言　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

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

蒋　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目　录

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 1
梁实秋小传 / 22
梁实秋的故事 / 23
正中平和　宽大为怀
——梁实秋先生的人生对我的启发 / 143



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2001年11月7日，我们在北京朝阳区水碓子一座普通公寓里，拜访了我国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梁实秋先生的长女梁文茜女士，那一年她74岁。1948年冬，梁实秋因国共两党政治斗争而离开大陆，和夫人程季淑及16岁的次女梁文蔷一道前往台湾。他22岁的长女梁文茜、19岁的儿子梁文骐都留在了大陆。从此，一家人隔断于海峡两岸，杳无音信，直到25年后的1974年，梁实秋辗转打听到孩子们在大陆的住址，从此转信往来，才知道了彼此的消息。

又过了8年，198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余毒的慢慢消逝，梁文茜才获准赶往美国西雅图她妹妹梁文蔷家，与从台湾专程赶来的父亲梁实秋得以在分别33年之后重聚，父女相见，抱头痛哭。

此时的梁文茜，已从分别时22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梁实秋之女梁文茜。

天命之年。梁实秋则从46岁的壮年人，变成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更令人痛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亲人相见，因政治隔绝之故，却不能在近在咫尺的大陆或台湾得以实现，而要赶到万里之遥的美国去重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剧。这种久别重逢，更加说明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感，它将最终战胜破坏人性的一切邪恶。

想家想死

那一天，梁文茜告诉我们：“1982年，我在美国见

到了分别33年的爸爸后，再也没有见到他，其实，那一次见面是一次永别。我在妹妹家只有两周时间，转眼即逝，最后爸爸送我到机场，飞机快起飞了，我们像有许多话咽在喉头说不出来，爸爸一直送我到机舱门口，再不能进去了，他手扶着飞机门框，沉重地对我说了一句‘保重’。这是我最后听见爸爸的声音，充满了感情的声音，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声音。

“1987年11月3日，电话铃响，在美国的小妹文蔷打来长途电话。我听见她说是小妹，但又半晌无声，我突然明白了，再问小妹，她呜咽着告诉我爸爸过世了的噩耗，我猛地坐下来，觉得昏昏沉沉。告诉你们，我爸爸是想家想死的！”

我们带着困惑问：“为什么说您爸爸是想家想死的？”

梁文茜说：“爸爸非常怀念家乡。数十年来，他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海外到处漂流，虽说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好，但唯独乡愁无法排解，他和妈妈总是念叨着，总有一天将双双回到本国的土地上去走一遭。为了争取能回老家的那一天，他费尽心力努力办理在美国长久居留的手续。因为只有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了美籍华人，他才能得到回乡探亲的待遇。如果不是美籍华人，在台湾的中国

人，都不能回大陆老家看一看啊！”

中国人成了外国人，才能回故乡看一看，这是什么道理啊？

梁实秋曾在80多岁的时候，写过一篇对家乡的回忆文章：

“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我生在一个四合院里，喝的是水窝子里打出来的甜水，吃的是抻条面煮饽饽，睡的是铺席铺毡子的炕，坐的是骡子套的轿车和人拉的东洋车，穿的是竹布褂、大棉袄、布鞋布袜子，逛的是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游的是公园、太庙、玉泉山，能说我不是道地的北平人么？”

梁文茜继续讲：“有一次，爸爸给我来信，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给我带点豆汁来！’这真是异想天开，让我好为难。我只能向父亲告罪：‘豆汁没法带，您到北京来喝吧！’还有一次，爸爸让我给他寄一点房山良乡的栗子，我寄去之后，由于路途遥远，都发了霉。这两样东西都是北京最普通的土特产，但对爸爸来说却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又有一次，我给他寄去一些北京蜜饯。爸爸不顾糖尿病的禁忌，拈起一块就放进嘴里，一边咀嚼还一边评论：‘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味，总算又尝到了！’

“要说爸爸感情最深的，自然要数北京内务部街20号

梁家的故宅，他不厌其详地告诉我们：内务部街的房子本是我们的老家，我就是生在那个老家的西厢房，原是祖父留下的一所房子。这所老房子比较大，约有房40间，院落较多，宜于大家庭居住。”

谈起这个故居，梁文蔷曾在1981年专门踏访过一次，她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81年夏，我和君迈到大陆探亲，经招待人员好心安排，我得特准进入北平旧居参观，那是我生长的庭院，也是爸爸出生的地方。1948年我离开时，那所房屋已年久失修，相当破旧，但仍有其规模在，没想到时过33年，那所老宅竟住了23家人，院子已经不见



画家况晗所绘的北京胡同最能表现梁实秋笔下的故土怀念意境。

了，原来的院子中盖满了违章建筑，全是厨房厕所之类的小屋，正中的空地上堆着一堆破砖烂瓦，上面又放着些盆景。我想当年回过大陆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触，真是一言难尽。

我在这熟悉又陌生的大杂院中漫步，努力寻找我还可以辨认的一砖一瓦，全部照相记录下来。我是有任务的，我必须要向爸爸做一个详尽的报告。临行时，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有小青枣一个，叫我带回台湾，送给爸爸。这棵枣树是我们住在北平时的老枣树的子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珍惜地将枣叶包在湿纸中，装入塑胶袋，放在手提包里，顺利地带到台北，立刻交给爸爸。这是我能给爸爸带去的最佳家乡礼物。

与爸爸相聚一周，把中国大陆见闻一五一十向爸爸报告，内容包括我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得痛哭流涕，喉咙沙哑，两人情绪都过度振荡，渐感不支。我回美后，爸爸来信说：

‘你此番远行，带给我的种种消息，有如一场梦魇，使我的心情如沸！那一枝枣树叶子和那一枚青枣，至今已有十日左右了吧，泡在玻璃杯里，依然绿色，谁云草木无情？我放在桌上，我看着一阵心酸，料想它对我亦应如是。’

数日后，又得来信云：‘故居的那一颗枣及树叶都枯萎了，叶子压在一本书里，可以长久保存，枣子则缩皱成为红枣，怕只能留着将来做枣泥了……寝室墙上挂的故居图，我打算摘下来，因为一看那张图就想起你摄的那些张相片，实在不堪回首。’约三周后，爸爸在来信的信尾又提起枣子的事：‘你带来的那颗枣，已成为标本了，很好看的一颗小红枣。’”

到了梁实秋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越发地想家，渴望回到北京看一看，他在梦中呼唤最多的是“妈妈”。就在他去世前7个月的1987年4月，台湾《联合报》主编访问梁实秋，曾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您对已过去的85年有无遗憾？”，二是“现在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梁实秋列举了五条引以为憾的事情，其中一条是：“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亦有同感。”对第二个问题，他回答道：“如今我最希望的事只有一件：国泰民安，家人团聚。”

梁文茜说：“爸爸突然发病那一天是1987年11月1日晚，这是有原因的。海峡两岸从1949年隔绝往来已经38年了，国民党当局蒋经国先生顺应民众，突然宣布从1987年11月2日开始解除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的禁令，这个特大喜讯让爸爸高兴死了。”

梁实秋的确是想家想死了，享年84岁的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墓地，这里高旷开阔。梁实秋为什么要在这里安息？他最后一任夫人韩菁清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萦的故乡”。

北师大之恋

梁实秋的一生，和北师大有着特殊的关系。1946年，梁实秋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因日本侵华而流亡大西南的9年生活，终于返回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北平。回到北平以后，他很快接受聘请到北师大英语系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和“文艺批评理论”等课程，他的儿子梁文骐曾描述了他在北师大上课时的动人情景：

“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匿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下如雨，讲到惨怛处，这女学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我问父亲：‘你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这一时期除学校工作外，梁实秋个人的学术志趣仍然集于莎剧的翻译。在艰苦的精神劳动中，给了他巨大的

精神慰藉和物质帮助的，还是他的妻子程季淑。自来北京后，程季淑就从婆母手里接过了全部家政。她日夜操劳，侍候公婆，同时，为使梁实秋专心工作，还把几个孩子的教育也一手承担起来。

梁实秋说：“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后4时，季淑必定给我送茶一盏，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我的翻译工作进行顺利，晚上她常问我这一天写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诉她写了三千多字，她就一声不响翘起她的大拇指。我译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她愿意知道我译的是些什么东西。”

他们到了台湾以后，梁实秋一直未敢懈怠学术上的进取，在夫人这个贤内助的全力支持下，他的翻译进展顺利。梁实秋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最后37种剧本译竟，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67年8月6日承朋友们的厚爱，以‘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的名义在台北举行庆祝会，到会者约300人，主其事者是刘白如、赵友培、王蓝等几位先生。有两位女士代表献花给我们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